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09期(民國109年9月),1-4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薩木薩克早年經歷考:
清朝在喀什噶爾與中亞帕米爾以西的政治困境,1759-1784*

惠男**

摘　要

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在取得平定大小和卓之戰的勝利後,意外地留下一個隱患:大和卓波羅尼都的幼子薩木薩克脫逃到中亞,並自此蟄伏數十載,不僅使和卓家族延續下來,也為日後和卓後裔在南疆的捲土重來積蓄力量。對於這位自幼流落他鄉的和卓後裔,目前仍有兩個關鍵問題待探討:首先,清朝的喀什噶爾官員在訪查孩童時期的薩木薩克時,先後得知有兩個薩木薩克存在,但他們的身世至今仍然都是個謎。其次,成年後的薩木薩克寓居於浩罕汗國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其早年的經歷卻鮮有人知曉。本文即以這兩個問題為切入點,通過滿文檔案探究薩木薩克的身世,並展現清朝統治新疆喀什噶爾之初所面臨的內部困境。此外,本文考述薩木薩克的早年經歷,揭示其與中亞帕米爾高原以西政治人物的交往,包括巴達克山的統治者素勒坦沙,阿富汗杜蘭尼王朝的君主艾哈邁德沙和帖木兒沙父子,以及昆都士的總督瑚巴特等。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對於理解十八世紀清朝和中亞的關係,至關重要。

關鍵詞:大小和卓、薩木薩克、巴達克山、阿富汗、昆都士

---

* 收稿日期:2019年6月1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2月24日。
**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一、緒　言

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中亞巴達克山的統治者素勒坦沙（Sultan Shah）將大小和卓拘殺，並按照將軍富德的要求獻馘，以示願爲大清藩屬之誠心。[1]在清朝的官方敘事中，「巴達克山諸部落，皆知獻俘自效」，「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爲我大清臣僕」，將此事件視作「西師之役」的結束標誌。[2]但是，大小和卓的勢力並未因此而完全粉碎，他們給清朝帶來的困擾才剛剛拉開序幕。

十九世紀以來，以張格爾爲代表的和卓後裔憑藉自身的影響力，屢次威脅清朝在南疆的統治，甚至於同治四年（1865）阿古柏侵入喀什噶爾之初，仍然挾持一位布素魯克和卓作爲浩罕的先導。[3]這些與和卓後裔有關的叛亂和戰爭的源頭，是十八世紀的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幼子薩木薩克（Sarimsaq）。大小和卓遁入巴達克山時，幼年的薩木薩克也被其父大和卓波羅尼都帶去，自此在中亞蟄伏數十載，爲和卓家族的捲土重來積蓄力量。關於薩木薩克這位具有延續和卓血脈作用的人物，過往的研究還留有一些重要問題亟需探討。

首先，薩木薩克的身世至今成謎。史載，清朝喀什噶爾的官員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查出「波羅尼都離異之妾愛什阿哈察所生子薩木薩克」。[4]乾隆

1　清朝與巴達克山圍繞大小和卓的交涉過程，參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94-98；馬子木，〈乾隆朝初通巴達克山考──兼論準噶爾遺產與清朝中亞外交之初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2 分（2017 年 6 月），頁 347-396。

2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599，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丑，頁 702-703。

3　這些與和卓後裔有關的叛亂和戰爭，包括張格爾之亂、玉素甫之亂、七和卓之亂和倭里罕之亂和阿古柏的入侵等等，具體經過參考：Hodong Kim,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6; 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亂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 113-215；潘志平，《中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 90-152；佐口透著，凌頌純譯（下略），《18-19 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頁 485-535、554-625。

4　〔清〕傅恒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冊 53，續編卷 10，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丙寅，頁 153。

皇帝赦免了薩木薩克，命人將他送到北京養育。但這個孩子剛到北京，就有薩木薩克早已逃去中亞的消息傳來，意味著最初的薩木薩克可能是冒牌貨。本文將此稱爲「眞假薩木薩克」事件。

如何確定兩個薩木薩克孰眞孰僞？這個問題尚屬懸案。例如，潘志平以薩木薩克爲切入點討論十八世紀清朝與浩罕的關係時提到，「清史料中關於薩木薩克和卓的信息相當混亂，似乎有三個薩木薩克和卓」，[5]卻沒有對史料作出基本梳理。而研究清代新疆和卓叛亂的潘向明認爲，假薩木薩克的發現使清朝覺得眞正的和卓後裔均已被尋獲，便不再繼續這方面的努力，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才意識到眞薩木薩克的存在。[6]這是頗値得商榷的。日本學者佐口透雖然判斷第一個薩木薩克並非波羅尼都之子，愛什阿哈察也非波羅尼都之妾，可是沒有提供任何史料依據。[7]

總體而言，薩木薩克的身世尚屬懸案。[8]由於乾隆年間與薩木薩克有關的一手史料都是未經翻譯的滿文奏摺，如果研究只基於《清實錄》、《平定準噶爾方略》等漢文史籍，恐怕就很難釐清史實。本文通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等檔案，[9]考訂薩木薩克的眞實身世，以及清朝搜尋和制定相關決策的過程。而這個長期懸而未知的問題，還折射出清朝統治新疆喀什噶爾之初所面臨的內部困境，本文擬一併申論說明。

其次，清朝既然獲悉第二個薩木薩克的消息，爲何沒有將他從中亞帶回境內？在「眞假薩木薩克」事件的兩年後，清朝成功將薩木薩克的三個哥哥從中

5 潘志平，《中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頁 59，註 2。

6 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亂研究》，頁 84-86。

7 佐口透，《18-19 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頁 98。

8 除潘向明、潘志平和佐口透以外，還有一些其他學者的論著：Kwangmin Kim, "Profit and Protection: Emin Khwaja and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1759-177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3 (August 2012), pp. 603-626；王力，《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頁 94-101；王希隆，〈乾隆、嘉慶兩朝對白山派和卓後裔招撫政策得失述評〉，《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2 期，頁 36-48。

9 本文使用的滿文檔案主要包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之《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以及兩部已經出版的滿文檔案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社，2011）。以下引用時均省略館藏地及編者。

亞引渡回國。[10]相較而言，薩木薩克受到了哪些可能制約清朝行動的中亞勢力的庇護？學界過去一直強調，是薩木薩克躲在浩罕汗國，才讓清朝鞭長莫及。這種觀點尤以英國探險家福賽斯（T. D. Forsyth, 1827-1886）在 1873 年出使葉爾羌時撰寫的旅行日誌為代表。[11]

1960 至 1970 年代的論著基本沿襲福賽斯的說法。1978 年美國學者傅禮初（Joseph F. Fletcher）撰寫《劍橋中國晚清史》時，對這段歷史的敘述內容就與此完全相同。[12]後進的部分學者甚至更形成刻板印象，認定薩木薩克在中亞的庇護者只有浩罕。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梳理清朝征服天山南路的過程，稱大小和卓以外的後裔「從喀什噶爾穿越帕米爾，被浩罕所收容」。[13]以研究阿古柏著稱的金浩東（Hodong Kim）認為，薩木薩克一直作為難民在浩罕生活。[14]這些觀點固然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浩罕的崛起是十八世紀晚期的事情，浩罕在此前不敢公然違抗清朝，[15]恐不具備保護薩木薩克的實力。值得注意的是，佐口透提到薩木薩克曾被藏匿在阿富汗北部，與杜蘭尼王朝（Durrani Empire）的艾哈邁德沙（Ahmad Shah）、帖木兒沙（Timur Shah）父子過從甚

---

10 王希隆，〈乾隆、嘉慶兩朝對白山派和卓後裔招撫政策得失述評〉，《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2 期，頁 38-39。

11 報告原文這樣寫道：「中國人每年資助浩罕可汗 3,660 鎊，用於控制和卓們因前者的征服而離開故土起所產生的敵意。在這些和卓中就有薩木薩克，他是阿帕克家族的最後傳人。經過多年在中亞的漂泊，晚年的薩木薩克定居於浩罕。」參考：T. D. Forsyth,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Under Command of Sir T. D. Forsyth* (Calcutta: Printed at the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1875), p. 182.

12 Joseph F. Fletcher, "Ch'ing Inner Asia c.18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88.

13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2.

14 Hodong Kim,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 pp. 10, 21.

15 例如，1761-1762 年浩罕曾與布魯特額德格訥部就鄂什的歸屬產生領土爭端。浩罕在清朝官員的施壓下被迫退讓，可見此時尚不具備抗拒清朝的實力。參見：L. J. Newby,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1760-186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 pp. 30-31; Takahiro Onuma, Kawahara Yayoi, and Shioya Akifumi, "An Encounter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Khoqand in 1759-1760: Central Asia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9:3 (2014), pp. 384-408; 潘志平，《浩罕國與西域政治》（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頁 30-31。

密。[16]或可推測清朝畏於艾哈邁德沙的強勢，方採取謹慎克制的態度，沒有去中亞大肆搜尋薩木薩克的蹤跡。不過此想法缺乏證據，需要更多的史料支撐。

杜蘭尼王朝對清朝決策之影響，屬於清朝與中亞關係史的範疇，而該領域的前行研究慣以浩罕汗國的發展作爲歷史敘事之主軸，很少注意到帕米爾高原以西包括阿富汗、巴達克山在內的國家、部族與清朝的關係。近十多年來，如吳勞麗（Laura Newby）、小沼孝博、金光明（Kwangmin Kim）和 Scott C. Levi 等中亞暨清代新疆史家的研究成果儘管顯赫，卻依舊無人能以佐口透的既有成果爲基礎，在薩木薩克的問題上提出新的觀點。[17]迄今爲止，唯有馬世嘉（Matthew W. Mosca）系統討論艾哈邁德沙征討巴達克山以挑戰清朝在中亞的地位，[18]但他並未思考這件事與薩木薩克的聯繫。而有無杜蘭尼王朝以外的勢力保護薩木薩克，更是一個未知問題。因此，本文將鉤沉薩木薩克在中亞的早年經歷，重建這段重要的歷史史實，進而展現清朝對待薩木薩克的政策在何種程度上受到中亞政治的影響。

二、清朝搜尋薩木薩克的過程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以大小和卓戕害副都統阿敏道爲開端，清朝開始實行對天山南路的征討政策，並於二十四年十月隨著小和卓霍集占首級的

16 佐口透，《18-19 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頁 102。

17 L. J. Newby,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1760-1860*, pp. 54-55; Takahiro Onuma, “The 1795 Khoqand Mission and Its Negotiations with the Qing: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Space of Qing Kashgaria,” in Ildikó Bellér-Hann, Birgit N. Schlyter, and Jun Sugawara, eds., *Kashgar Revisited: Uyghur Studies in Memory of Ambassador Gunnar Jarring* (Leiden: Brill, 2016), pp. 91-115; Kwangmin Kim, *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93; Scott C. Levi, *The Rise and Fall of Khoqand, 1709-1876: Central Asia in the Global Ag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7), p. 136.

18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0-83.

移交而結束戰爭。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後，如何防止大小和卓的殘存勢力捲土重來當屬清廷君臣的新目標，由是成為清朝搜尋和卓後裔決定之發端。

乾隆皇帝下諭追尋大和卓波羅尼都子嗣的時間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七月，距離大小和卓出逃已逾一載有餘。他以硃批的形式將這個決定秘密告知參贊大臣阿里袞：「聽聞伊（波羅尼都）有幼子三、四名，應愈加留意此事。」[19]按照部署，阿里袞僅與阿克蘇辦事大臣舒赫德、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聯合，由三人以小範圍的形式展開搜尋工作。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海明收到親隨兵丁的密報，聲稱他們所僱傭使喚的回子薩哈特（hoise sahat）曾聽人談論道，「大和卓木有一幼子，現養於阿爾瓦特莊名喚博羅特索丕之人家中」。[20]接到這份報告後，海明於次日悄悄傳召薩哈特，詢問具體情況。薩哈特稟報稱：[21]

> 聽聞阿爾瓦特人議論，大和卓木初至喀什噶爾，就派人處死亦思馬因阿訇，娶其女愛什阿哈察。伊懷孕後，又賞給玉素甫巴什。生有一子，名薩木薩克。因愛什阿哈察殺死玉素甫巴什，大和卓木惱怒，將愛什阿哈察吊死於市。大和卓木逃去巴達克山時，此子被名為達斯哈喇之人帶走，曾養於伯什克勒木地方。邁喇木作亂後，達斯哈喇已喪於戰火。伯什克勒木人潰散後，此子現被養於阿爾瓦特莊名喚博羅特索丕之人家中。所聞實也。
>
> amba hojom hasihar de teni isinjiha fonde. ismyel ahun be wafi. ini sargan jui aiši ahaca be gaifi takūraha. beye jursulehe manggi. geli yusub baši de

19 〈參贊大臣阿里袞奏尋找波羅都屍首片〉，《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8-1826-007，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二日。滿文轉寫為："inde ilan duin ajige jui bi sembi. erebe ele gūnin tebuci acambi."

20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滿文轉寫為："amba hojom de emu ajige jui bi. ne arwat gašan i bolot sopi gebungge niyalmai boode ujihabi seme niyalma gisurendure be donjiha sembi."

21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šangname bufi emu haha jui banjiha. gebu samsak. amala aiši ahaca. yusub baši be waha turgunde. amba hojom fancafi aiši ahaca be badzar de lakiyame wahabi. amba hojom badakšan de genehede. ere jui be dashara gebungge niyalma gaifi bešikerem i bade ujiha bihe. mairam ubašafi afara de. dashara bucehe. bešikerem i urse samsiha manggi. ere jui be ne arwat gašan i bolot sopi gebungge niyalmai boode ujihabi seme arwat i ursei gisurecere be bi donjihangge yargiyan.

結合相關史實，上述這段話中，涉及薩木薩克身世的訊息可提煉爲三點：

一、波羅尼都幼子之名爲薩木薩克（samsak），其生母爲愛什阿哈察（aiši ahaca）。阿哈察者，伯克之妻妾也。根據《回疆通志》的記載，「伯克之妻，回人稱之曰阿哈察，即有娶三四妻者，皆同此稱謂，無大、小、嫡、庶之分」。[22]

二、波羅尼都強娶愛什阿哈察爲妾及薩木薩克出生的背景。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清朝進佔伊犁後，將大小和卓從準噶爾汗國的囚禁中解救出來，並允許這對兄弟返回喀什噶爾、葉爾羌招撫回部。[23]大小和卓甫至天山南路，就藉機對夙仇展開了血腥報復，[24]愛什阿哈察之父亦思馬因阿訇（ismyel ahun）當死於此時，而愛什阿哈察本人亦被波羅尼都霸佔。在愛什阿哈察懷孕時，波羅尼都將她賞給自己的下屬玉素甫巴什（yusub baši）爲妻。薩木薩克是在母親改嫁後出生的。

三、愛什阿哈察謀害繼夫玉素甫巴什的舉動觸怒了波羅尼都，爲此被吊死在喀什噶爾的集市上。這意味著當海明從薩哈特口中獲得消息時，薩木薩克的親生父母、繼父皆已不在人世。

得知薩木薩克現由阿爾瓦特莊（arwat gašan）回子博羅特索丕（bolot sopi）代爲養育後，海明便派人去尋找。南疆的社會爲城一回莊（hoton-gašan）式二

22 〔清〕和寧纂，《回疆通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 12，〈風俗〉，頁 403。

23 劉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237-243。

24 Muhammad S. Kashgari, “The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Turkistan,” trans. Robert B. Shaw,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Bengal*, Vol. LXVI, Part I, 1897, supplement, p. 53; 劉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頁 243-248。

元結構，每個綠洲的中心城市之下有屬城，屬城之下又有回莊。[25]阿爾瓦特莊恰是喀什噶爾所屬村莊，由喀什噶爾大臣管轄。不過，清朝官兵發現博羅特索丕不在家中，從他的妻子口中得知薩木薩克已被其姨母畢比依愛扎爾（bibii aijar）領走。眾人最終在畢比依愛扎爾的家中找到了薩木薩克，並將他的舅舅阿卜撒哲特（absajet）和姨母一起押走。薩木薩克被帶到海明面前時，他感覺這個孩子「有四、五歲左右，舉動大方，與小回之子稍異」，[26]命屬下妥善看護，並親自審訊薩木薩克的舅舅和姨母，意圖獲得更多有關薩木薩克身世的訊息。阿卜撒哲特的供詞如下：[27]

> 我乃亦思馬因阿訇之子，先前大和卓木抵達阿斯圖阿爾圖什地方時，喀什噶爾城眾人騷亂。四處潰散逃離時，我父亦思馬因阿訇將我全家、與我姐愛什阿哈察、伊之夫莫羅米奇特阿訇全部帶走。逃向安集延時，大和卓木派人追趕，全部抓獲後帶回。唯我本人、我大兄愛撒二人逃出，前往浩罕……前日剛回到喀什噶爾，暫住我妹畢比依愛扎爾家中，方聽聞先前大和卓木將我父亦思馬因阿訇、我兄瑪哈默特馬舒克、我姐之夫莫羅米奇特阿訇等皆處死後，娶我姐愛什阿哈察，留在身邊三、四個月後，又賞給玉素甫巴什。因我姐殺死玉素甫巴什，我姐愛什阿哈察亦被殺等事，四、五日前，博羅特索丕將我姐所生之幼子薩木薩克帶來後，稱因眾人皆言此子為大和卓木之子，我惶恐而不敢養育，便將薩木薩克交與畢比依愛扎爾。因有受此事牽連之處，我等皆畏懼，商議欲告於伯克等之時，大人便派人來取此子。

25 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變遷爲中心》（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頁 242-243。

26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滿文轉寫爲：“duin sunja se i šurdeme bi. aššara arbušarangge iletu. buya hoise i juse ci majige encu.”

27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bi ismayel ahun i jui. neneme amba hojom astu artuši i bade isinaha fonde. hašihar[28] hoton i geren urse facuhūrafi. balai samsime ba bade jailame genere de mini ama ismayel ahun meni booi gubci. jai mini eyun aiši ahaca. ini eigen molo micit ahun be yooni gaifi anjiyan i baru ukame genere de. amba hojom niyalma takūrafi amcabufi gemu jafafi amasi gajiha. damu mini beye. mini emu ahūn aisa. meni juwe nofi ukcame tucifi hoohan de genehe. …jakan teni amasi hasihar de marifi mini non bibii aijar i boode taka tehe manggi. neneme amba hojom mini ama ismayel ahun. mini ahūn mahamet masuk. mini eyun i eigen molo micit ahun sebe gemu wafi. mini eyun aiši ahaca be amba hojom gaifi ilan duin biya bibufi. geli yusub baši de šangnaha. amala mini eyun yusub baši be waha turgunde. mini eyun aiši ahaca be inu waha jergi babe teni donjiha. duin sunja inenggi i onggolo bolot sopi. mini eyun i banjiha ajige jui samsak be gajifi alaha bade. geren gemu ere jui be amba hojom i jui sere jakade. bi geleme ujirakū oho sefi. samsak be bibii aijar de afabuha. ere baita holbobuha ba bisire turgunde. be gemu gelefi bek sede alaki seme hebešere sidende. amban niyalma takūrafi ere jui be gajiha.

姨母畢比依愛扎爾的供述與舅舅相似，他們的話和薩哈特沒有矛盾的地方。不過，舅舅和姨母補充了愛什阿哈察在嫁給波羅尼都之前又有前夫的新資訊，此人名叫莫羅米奇特阿訇（molo micit ahun），亦被波羅尼都殺死。至於愛什阿哈察誕育薩木薩克之事，舅舅、姨母都沒有見證這一過程，只是聽說了愛什阿哈察曾侍奉波羅尼都的傳聞。事發時，阿卜撒哲特身在浩罕，姨母畢比依愛扎爾早已外嫁。

爲確保薩木薩克的身分無誤，海明召集喀什噶爾城的大小伯克，將薩木薩克已被查出的消息告知眾人，並要求他們辨認薩木薩克的容貌。經過一番查

28 喀什噶爾之滿文於不同檔案中書寫有異，有：hašihar、hasigar、kasigar、kašigar 等。

看，喀什噶爾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abdurim）回稟道：[29]

> 看此幼子薩木薩克之容貌，頭骨、前額處，與大和卓木相似。婦人愛什阿哈察原為莫羅米奇特阿訇之妻，大和卓將其夫殺害後，收娶愛什阿哈察，留在身邊數月後，雖又給與玉素甫巴什，仍不時召入。後因愛什阿哈察殺死玉素甫巴什，愛什阿哈察亦被吊死等事，我眾人皆知。大和卓木好色，時常挑選容貌姣好之婦人收納。因愛什阿哈察貌美，大和卓木納娶後確有生子事，唯愛什阿哈察給大和卓木生子後迄今所有之事，我等誠不知也。

> ere ajige jui samsak i banin be kimcici. uju i giranggi. šenggin i ba amba hojom de adališambi. hehe aiši ahaca daci molo micit ahun i sargan bihe. amba hojom ini eigen molo micit ahun be wafi. aiši ahaca be bargiyame gaifi ududu biya bibufi. geli yusub baši de buhe bicibe. kemuni ton akū hūlame dosimbumbi. amala aiši ahaca. yusub baši be waha turgunde aiši ahaca be inu lakiyame waha jergi baita meni geren gemu sambi. amba hojom boco de amuran. an i ucuri banin sain hehesi be uthai sonjofi bargiyambihe. aiši ahaca i banin saikan ofi. amba hojom bargiyafi jui banjihangge inu bisire baita. damu aiši ahaca amba hojom de jui banjifi tetele bisire babe. be sarkūngge yargiyan.

阿布都喇伊木原本是大小和卓的親信，於乾隆二十四年清軍逼近喀什噶爾城之際歸降，被清朝任命爲喀什噶爾的伊什罕伯克。至二十九年（1764）七月，他因「未授爲阿奇木，心懷背叛」，[30]私向浩罕洩漏消息並唆使對方攻取喀什噶爾。海明無法預料後事，而作爲曾接觸過波羅尼都的高級伯克，阿布都喇伊木的話無疑頗具說服力。他肯定了愛什阿哈察的三次婚姻順序、懷孕生子以及死因等事，但在薩木薩克是否爲波羅尼都親子的問題上，態度極爲曖昧。雖然暗

29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30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15，乾隆二十九年七月丙寅，頁 974-975。

示兩者的容貌相近，卻沒有對薩木薩克的身分下定論。在關鍵的問題上，阿布都喇伊木給出了模稜兩可的答案，頗有誘導海明得出結論的意味。阿布都喇伊木爲增加自己的說服力，還對海明表白歸順清朝以來的心跡，「我等皆曾承受大和卓木之摧殘，幾乎殞命。大主汗之天兵降臨後，方才將我等救活復生」，[31] 發誓絕不會包庇波羅尼都的兒子。

無論這誓言有多少說服力，阿布都喇伊木畢竟沒親眼目睹薩木薩克的誕生，海明還需要繼續搜尋關鍵證人。這名證人就是愛什阿哈察之父亦思馬因阿訇的繼室、並身爲薩木薩克乳母的葉德格爾畢比依（yedeger bibii）。據稱：[32]

> 先前大和卓木初至喀什噶爾，即將我全家悉數追拿……大和卓木將莫羅米奇特阿訇之妻愛什阿哈察收娶……兩、三月過後，大和卓木將愛什阿哈察出與玉素甫巴什。六、七月過後，愛什阿哈察生有此幼子薩木薩克……又兩、三月後一日夜間，玉素甫巴什、愛什阿哈察彼此大吵……愛什阿哈察蓄意與伊之前夫莫羅米奇特阿訇之舊家人玉素甫，一同在夜間偷偷將玉素甫巴什勒死。後大和卓木聽聞，甚是惱怒。將玉素甫絞死後，愛什阿哈察、我皆被捆綁，繞城示眾時，愛什阿哈察高聲喊道：「把大和卓木找來，若不念我為他生子，現在把我殺了吧。」此說與眾人之言，無不聽聞。索丕等將此語告訴和卓木，和卓木稱：「何聽此言？抓來殺了就行。」愛什阿哈察被帶去市集吊死，把我、愛什阿哈察之三子一同賞給莫羅瓦斯後，莫羅瓦斯以愛什阿哈察先前所生一兒一女為莫羅米奇特阿訇之子，而皆殺害，將我配給伊信賴任用之、在伯什克勒木臨近之色迪爾莊居住、名喚達斯哈喇之人，將此薩木薩克交與我等哺育。前年，大和卓木逃去巴達克山時……達斯哈

31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滿文轉寫爲："be gemu amba hojom i ujen koro bahafi elei bucehe niyalma bihe. amba ejen han i abkai cooha isinjiha manggi. teni membe aitubufi dasame banjibuha."

32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喇帶薩木薩克、我躲到溝渠，故未跟去。去年，邁喇木作亂時，在伯什克勒木地方戰鬥，達斯哈喇死於戰火。眾皆騷亂，零散逃亡時，我抱著自己剛出生的女兒，在夜間偷偷逃走到喀什噶爾城內，薩木薩克及達斯哈喇的女兒阿舒爾什等留在色迪爾莊。後薩木薩克被博羅特索丕如何帶走養育之處，我誠不知也。詢問達斯哈喇之女阿舒爾什就知道了。又薩木薩克今年五歲，在其所生次年出過痘。

neneme amba hojom tuktan hasihar de isinjime. uthai meni booi gubci be yooni fargame jafafi…molo micit ahun i sargan aiši ahaca be. amba hojom bargiyame gamaha. …juwe ilan biya oho amala. amba hojom aiši ahaca be tucibufi. yusub baši de bufi ninggun nadan biyai oho manggi. aiši ahaca ere ajige jui samsak be banjifi. …geli juwe ilan biya ofi. emu inenggi i yamji yusub baši. aiši ahaca ishunde ambarame becunure de…aiši ahaca gūnin tebufi. ini nenehe eigen molo micit ahun i fe booi niyalma yusub i emgi dobori jendu yusub baši be tatame waha manggi. amba hojom donjifi umesi fancafi. yusub be tatame wafi. aiši ahaca. mimbe gemu huthufi. geren de tuwabume hoton šurdere de. aiši ahaca den jilgan i sureme. amba hojom be hūlame. bi inde jui banjiha be gūnirakū. te mimbe wambi seme geren de alaha be donjihakūngge akū. sopi se ere gisun be hojom de alaha manggi. hojom i gisun. ere gisun be aiseme donjimbi. gamafi waci wajiha sehede. aiši ahaca be badzar de gamafi lakiyame bucebuhe. mimbe aiši ahaca i ilan jui i sasa gemu molowas de šangnaha. molowas. aiši ahaca i onggolo banjiha emu haha bi. emu sargan jui be molo micit ahun i juse seme gemu wafi. mimbe ini akdafi baitalara bešikerem i hanci sedir gašan de tehe dashara gebungge niyalma de acabufi. ere samsak be mende afabufi huhunleme ujibuha. cara aniya amba hojom badakšan de genere de. …dashara. samsak mini beyebe gaifi yohoron de jailame somiha ofi

dahame genehekū. duleke aniya mairam ubašafi. bešikerem i bade afara de. dashara dain de bucefi. geren gemu facuhūrafi son son i ukara de. bi mini banjiha huhuri sargan be tebeliyefi farhūn dobori jendu ukafi hasihar hoton de dosika. samsak. jai dashara i sargan jui ašurši se sedir gašan de bi. amala samsak be bolot sopi adarame gamafi ujiha babe bi sarkūngge yargiyan. dashara i sargan jui ašurši de fonjici endereo. jai samsak ere aniya sunja se. imbe banjiha jai aniya de mama eršehe seme jabumbi.

葉格德爾畢比依是愛什阿哈察從懷孕到誕下薩木薩克的親歷者，亦是愛什阿哈察死亡的見證人，擁有無可辯駁的優勢。她對愛什阿哈察十月懷胎時間的敘述，使海明基本上鎖定薩木薩克作爲波羅尼都親子的身分。在愛什阿哈察死後，葉格德爾畢比依被波羅尼都的親信嫁到喀什噶爾所屬伯什克勒木（bešikerem）附近的色迪爾莊（sedir gašan）。伯什克勒木是當時反清情緒較高的地方，以至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喀什噶爾商伯克邁喇木散布謠言，煽動當地上千名回人暴動。[33]葉格德爾畢比依的繼夫達斯哈喇（dashara）命喪於邁喇木之亂的戰火，而她則趁亂逃回喀什噶爾城，將薩木薩克與繼女阿舒爾什（ašurši）拋棄在色迪爾莊。隨後，海明找到阿舒爾什詢問情況。阿舒爾什稱其父達斯哈喇「繼娶葉格德爾畢比依時，帶來一幼子薩木薩克」，[34]在養育薩木薩克的兩、三年間，阿爾瓦特莊的博羅特索丕時常到此探望。邁喇木之亂時，阿舒爾什爲避難逃到阿爾瓦特莊後遇到博羅特索丕，對方得知薩木薩克仍在色迪爾莊，便立刻趕去營救。

最後的任務就是找到失蹤的博羅特索丕，他是確認薩木薩克身分的最後一片拼圖。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gadaimet）

33 潘志平，〈1759 年－1911 年新疆的變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42-55；眞田安，〈乾隆 25 年カシュガル反乱：中央アジア·オアシス社会の権力構造の究明にむけて〉，《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號 38（2014 年 3 月），頁 112-148。

34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滿文轉寫爲："sirame sargan yedeger bibii be gaire fonde. emu ajige jui samsak be gajifi."

將博羅特索丕捉拿歸案，他供稱：[35]

> 我乃看守大和卓木祖墳之索丕。此幼子薩木薩克者，愛什阿哈察所生也。因其母殺害玉素甫巴什，大和卓木將其母亦勒死。後此子被交給伯什克勒木之密喇布伯克莫羅瓦斯養育。莫羅瓦斯跟隨大和卓木逃去巴達克山後，此子被交給定居在伯什克勒木臨近色迪爾莊之達斯哈喇養育。我去色迪爾村看望葉格德爾畢比依時，曾看到薩木薩克。後邁喇木作亂時，達斯哈喇被殺，之後達斯哈喇之女阿舒爾什逃到我所居住之阿爾瓦特莊，我問起葉格德爾畢比依和薩木薩克，被告知葉格德爾畢比依逃走，將薩木薩克丟棄在色迪爾莊後，我想到這是大和卓木收娶妻子所生之子，奔赴色迪爾莊，將此子帶走撫養，此實也。四、五日前，因眾人紛紛議論薩木薩克乃大和卓木之子，我甚是恐懼，將此子送給他的姨母畢比依愛扎爾後，我就躲避了。此亦實也。
>
> bi amba hojom i mafari eifu be tuwakiyara sopi. ere ajige jui samsak serengge. aiši ahaca de banjihangge. ini eniye yusub baši be waha turgunde. amba hojom ini eniye be inu lakiyame bucebuhe. amala ere jui be bešikerem i mirab bek molowas de afabufi ujibuha. molowas. amba hojom be dahame badakšan de genehe manggi. ere jui be bešikeram i hanci sedir gašan de tehe dashara de afabufi ujibuha. bi yedeger bibii be tuwaname sedir gašan de genehe de. samsak be sabuha bihe. amala mairam i facuhūn de dashara wabuha manggi. dashara i sargan jui ašurši ukame mini tehe arwat gašan de jihede. bi yedeger bibii. samsak be fonjire de. ašurši. yedeger bibii be ukaka. samsak be sedir gašan de waliyaha seme minde alaha manggi. bi amba hojom i bargiyame gaiha hehe de banjiha jui seme gūnime. sedir gašan de genefi. ere jui be gajifi ujihangge yargiyan.

35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duin sunja inenggi i onggolo geren urse dur seme gemu samsak be amba hojom i jui seme gisurere jakade. bi umesi gelefi. ere jui be ini deheme bibii aijar de benebufi. bi jailahangge inu yargiyan.

博羅特索丕的話對應了漢文史料的記述。根據《平定準噶爾方略》載，「波羅泥都逃走時，將伊子交伯什克勒木之密喇卜養育」。[36]「密喇卜」即博羅特索丕說的「密喇布伯克」（mirab bek），專司「水利疏濬灌溉之務」。[37]伯什克勒木的密喇布伯克莫羅瓦斯奉波羅尼都之命看護薩木薩克。他逃赴巴達克山後，薩木薩克被送到色迪爾莊的達斯哈喇家中，又因戰亂被救至阿爾瓦特莊。初到阿爾瓦特莊時，博羅特索丕稱薩木薩克爲玉素甫巴什之子，所以他的身分沒有曝光。但此子生母愛什阿哈察曾爲波羅尼都的侍妾，「眾人紛紛議論薩木薩克乃大和卓木之子」。議論傳到回子薩哈特的耳中後，便引來了搜尋薩木薩克的清朝官兵。

海明最終將所有當事人的口供集齊，確定從薩木薩克在喀什噶爾出生，到依次被移送到色迪爾莊、阿爾瓦特莊的過程中，每個環節都有人證，他們的資訊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海明堅信，這個最後流落到阿爾瓦特莊的薩木薩克，就是大和卓波羅尼都的親生骨肉。

三、「真假薩木薩克」事件與清朝的困境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薩木薩克都被海明送到京城。乾隆皇帝念「薩木薩克乃一乳兒」，應「好生撫養，毋庸加罪」，準備將赦免恩旨曉諭各回城，並思及波羅尼都尚有幼子二名，「恐亦如此藏匿撫養」，要求新到任的喀什噶爾辦

36 〔清〕傅恒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12，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戊寅，頁 176-177。

37 〔清〕劉統勛、傅恒等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冊 500，卷 30，〈官制二．附回部舊官制〉，頁 629。

事大臣永貴、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加大稽查力度，照薩木薩克之例查訪波羅尼都其他兒子的下落。[38]

然而，薩木薩克的故事並未結束。同年，清朝官員發現中亞還存在一個薩木薩克，亦為大和卓之子；與北京的薩木薩克相較，兩人孰真孰偽，竟成一樁未解的公案。本節將進一步討論「真假薩木薩克」的身世，並以此為例分析清朝在統治新疆之初所面臨的內部困境。

（一）薩木薩克的再次現身

在赦免諭旨傳到回疆前，舒赫德等人就已經通過剛從巴達克山贖回的葉爾羌回子台里卜和卓（tailib hojo）的口中得知，在巴達克山還有三個波羅尼都的兒子被素勒坦沙控制著：[39]

> 波羅尼都的大阿哈察珠賚哈，生子名和卓阿什木。又一阿哈察巴達穆，準噶爾厄魯特人也，伊所生之子名喚阿卜都哈里克。又布魯特厄爾羌阿哈察所生之子名為和卓巴哈敦。此三子現在巴達克山居住。和卓阿什木母子由莫羅巴拉特贍養，和卓阿卜都哈里克、和卓巴哈敦母子由莫羅米爾奴魯思贍養。此二名看護之人，皆波羅尼都屬人。此外，素勒坦沙又派名為莫羅阿卜都拉阿訇之人，與莫羅米爾奴魯思一道照料和卓阿卜都哈里克母子四人。派名為米爾札阿達利卜之人，與莫羅巴拉特一道照料和卓阿什木母子二人。
>
> buranidun i amba ahaca julaiha de banjiha jui gebu hojo asim. geli emu ahaca gebu badam. jun gar i ūlet. erei banjiha jui gebu abduhailik. geli burut erkiyang ahaca i banjiha jui gebu hojo bahadun. ere ilan jui ne badakšan debi. hojo asim i eme jui be molobarat tuwašatame ujimbi. hojo abduhailik. hojo bahadun i eme jui be molomir nurus tuwašatame ujimbi.

38 〈寄諭左都御史永貴等將大和卓木乳子薩木薩克不予問罪一事曉諭回眾〉，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收入《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2，頁 576。

39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舒赫德奏請派人到巴達克山設法帶回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76-018，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re juwe tuwašatara niyalma gemu buranidun i niyalma. ereci tulgiyen. sultanša geli molo abdula ahung sere gebungge niyalma be tucibufi molomir nurus i sasa hojo abduhailik i eme jui duin niyalma tuwašatahabi. mirdza adalib sere gebungge niyalma be tucibufi molobarat i sasa hojo asim i eme jui juwe niyalma be tuwašatahabi.

和卓阿什木（hojo asim）、阿卜都哈里克（abduhailik）與和卓巴哈敦（hojo bahadun）都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被清朝引渡歸國，此爲後話。除此三人外，台里卜和卓提到波羅尼都還有一個小兒子，未知其名字：[40]

又一幼子被名為伊里亞斯之回子在盜取波羅尼都屍骸時，一併帶走逃到伊穆馬拉、琿都斯、塔勒干等處。現在巴達克山有三子，皆各自養育，素勒坦沙全然不管。伊等發愁當賣所有物品糊口度日。此皆我所親眼目睹。

geli emu ajige jui be iliyas gebungge hoise. buranidun i giran be hūlhame gamara de. suwaliyame imamla hūdus. talgan i jergi bade ukame gamaha. ne badakšan de bisire ilan jui oci. gemu teisu teisu banjimbi. sultanša fuhali darakū. ese facihiyašame bisire jaka hacin be uncame inenggi hetumbumbi. ere gemu mini yasai sabuhangge.

關於回子伊里亞斯（iliyas）盜取波羅尼都屍骸一事，據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富德的奏摺可知：清朝派外交使團到巴達克山索要大小和卓的屍骸時，負責驗明屍身的右衛滿洲兵納達齊發現，「掩埋霍集占屍骸坑中築有土墻間隔，一邊刨出霍集占，一邊並無波羅尼都屍骸，惟血跡尚存」。[41]在清朝使者抵達前，伊里亞斯就帶著那名孩子逃到更遠的地方。

---

40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舒赫德奏請派人到巴達克山設法帶回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76-018，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41 〈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奏巴達克山歸附並獻霍集占屍骸奏凱旋班師摺〉，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1，頁 398。

就在此時，乾隆皇帝的恩旨也送到喀什噶爾。舒赫德決定先派台里卜和卓到巴達克山曉諭三子，規勸他們早日投誠，暫不理會那名幼子的下落。然而，台里卜和卓從巴達克山回來後，竟給舒赫德等人帶來一個驚天消息：[42]

> 大和卓木又與愛什阿哈察生有一子，名為薩木薩克，由伊里亞斯之妻哺乳。盜取波羅尼都屍骸之際，除伊里亞斯攜薩木薩克逃往伊穆馬拉、琿都斯等處外，餘下三子皆住在巴達克山。
>
> amba hojom de geli emu aiši ahaca de banjiha jui bi. gebu samsak. iliyas i sargan huhun ulebumbi. buranidun i giran be hūlhame gamara de. samsak be iliyas gaifi gamame immala gūndus i jergi bade ukame geneheci tulgiyen. funcehe ilan jui gemu badakšan de tehebi.

被回子伊里亞斯攜往伊穆馬拉、琿都斯的幼子也叫薩木薩克，且都是愛什阿哈察所生。此消息難免令人震驚，愛什阿哈察的兒子薩木薩克早已在北京受到嚴密的看管，怎會又冒出一個在伊穆馬拉、琿都斯的薩木薩克？在額敏和卓（emin hojo）的協助下，舒赫德從台里卜和卓的口中獲得了更具體的信息：[43]

> 大和卓木有四子，先前皆定居於巴達克山。其中名薩木薩克者，伊里亞斯夫妻盜取大和卓木骸骨時，將其帶走逃往琿都斯、塔勒干、伊穆馬拉等處，此乃我親眼所見之事。薩木薩克彼時才兩歲，現已四歲矣。薩木薩克者，厄魯特愛什阿哈察所生也。此母子過去皆曾與伊里亞斯夫妻住在一處。喀什噶爾又有一回子愛什阿哈察也，原為莫羅米奇特阿訇之妻。大和卓木將莫羅米奇特阿訇誅殺後，娶其為妾。接著又將此女給與玉素甫巴什為妻。後聽聞，因回子愛什阿哈察將其夫玉素甫巴什殺死，大和卓木將伊從街帶來後勒死時伊咒罵道：「我乃有孕之

42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舒赫德奏查實薩木薩克是否是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78-001，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3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舒赫德奏查實薩木薩克是否是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78-001，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身，此子乃大和卓木之子！」街上帶走後勒死之事，現在京城之薩喀勒、索丕皆知也。

amba hojom de duin jui bi. onggolo gemu badakšan de tehe bihe. erei dorgi emke gebu samsak. iliyas i eigen sargan. amba hojom i giran be hūlhafi gamara de. samsak be gaifi gūndus talgan imamala i jergi bade ukame genehe. ere mini yasai sabuha baita. samsak tere fonde teni juwe se. te duin se ohobi. samsak serengge. ūlet aiši ahaca de banjihangge. erei eme jui gemu iliyas i eigen sargan i emgi emu bade tehe bihe. hasihar de geli emu hoise aiši ahaca bi. daci molomicidi ahung ni sargan bihe. amba hojom. molomicidi ahung be wafi asigan (sic.< asihan) sargan obuha. sirame geli ere hehe be yosub baksi de sargan buhe. amala donjiha bade hoise aiši ahaca. ini eigen yosub baksi be waha turgunde. amba hojom. imbe giyai de gamafi tatame gisurehengge. bi te jursu beye. ere jui amba hojom i jui seme toome yabume giyai de gamafi tatame bucebuhe sere. ere jergi babe ne gemun hecen de bisire sakal sopi gemu sambi.

波羅尼都曾有兩個同名爲愛什阿哈察的侍妾，族屬分別是厄魯特和回子，這是此前沒人提過的新情報。舒赫德只得再次召集阿布都喇伊木等人來問話，後者居然一改先前口風：[44]

波羅尼都有一厄魯特愛什阿哈察，其所生之子名薩木薩克。我曾目睹。又有一回子愛什阿哈察，原為莫羅米奇特阿訇之妻。波羅尼都將其強娶後，不久即給與玉素甫巴什。至彼所生為何人子？何名？是否為薩木薩克？我全然不知。

buranidun de emu ūlet i aiši ahaca bi. erei banjiha jui gebu samsak. bi sabuha. geli emu hoise aiši ahaca bi. daci molomicidi ahung ni sargan.

44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舒赫德奏查實薩木薩克是否是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78-001，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buranidun durime gaifi goidahakū uthai yosub baksi de buhe terei banjihangge we i jui. gebu. inu samsak be bi fuhali sarkū.

果不其然，阿布都喇伊木此前模稜兩可的態度誤導了海明。他現在承認知道厄魯特愛什阿哈察的存在，也確定她是薩木薩克的生母；但談到回子愛什阿哈察母子時，竟稱無法確定其身分，甚至於第一個薩木薩克的眞名是否爲薩木薩克，都無法給予肯定回答。

就在陷入僵局之時，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幫助舒赫德尋找到關鍵證人，即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其睦的姐姐濟爾噶勒（jirgal）。濟爾噶勒曾近身侍奉過波羅尼都，並隨他同赴巴達克山，是以「波羅泥都之妻俱係素識」。[45]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後來從素勒坦沙手中討走波羅尼都的其餘三個兒子時，也經過了濟爾嘎勒的辨認。據其敘述：[46]

波羅尼都之厄魯特愛什阿哈察，乃收取霍勒博斯部厄魯特後所娶也。後因生有一子，命名為薩木薩克，賊稱此女為愛什阿哈察。回子阿哈察者，曾為莫羅米奇特阿旬之妻。莫羅米奇特阿旬者，圖爾都和卓父前磕頭行走之人也。波羅尼都因與圖爾都和卓有仇，故將莫羅米奇特處死，其妻即給與玉素甫巴什。後聞其為美女，要回容留十餘日後，又給與玉素甫巴什。愛什阿哈察將其夫玉素甫巴什殺死後，波羅尼都動怒，將愛什阿哈察自街上抓來勒死時，愛什阿哈察喊道：「我現生之子，是大和卓木的兒子啊！為什麼要殺了我？」此語說與大和卓木聽後，大和卓木稱：「不是我的兒子！倘若是真的，自己的兒子豈會推托於人？你們不用聽，殺了就行。」愛什阿哈察被勒死之事，我皆知矣。我亦聽聞，回子愛什阿哈察，自離開波羅尼都後，在玉素甫巴什家中生有一子。

45 〔清〕傅恒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21，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戊午，頁 315-317。
46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舒赫德奏查實薩木薩克是否是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78-001，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buranidun i ūlet aiši ahaca serengge. holbos aiman i ūlet be bargiyaha manggi. gaihangge. amala haha jui banjiha turgunde. jui be samsak seme gebulefi hehe be aiši ahaca seme hūlaha. hoise ahaca serengge. molomicidi ahung ni sargan bihe. molomicidi ahung serengge. turdu hojo i ama de hengkileme yabuha niyalma. buranidun. turdu hojo de kimungge ofi. molomicidi be wafi. ini sargan be uthai yosub bakši de buhe. amala sain hehe seme donjifi amasi gajifi juwan funcere inenggi bibufi. geli yosub bakši[47] de buhe. aiši ahaca. ini eigen yosub baksi be waha manggi. buranidun jili banjifi aiši ahaca be giyai de gamafi tatame bucebure de aiši ahaca sureme hūlahangge. mini ne banjiha jui serengge. amba hojom i jui kai. mimbe aiseme wambi sehe babe. amba hojom de alaha manggi. amba hojom i gisun. mini jui waka. unenggi yargiyan oci. beye i jui be geli niyalma de anambio. suwe ume donjire. waci wajiha seme aiši ahaca be tatame waha be bi gemu sambi. hoise aiši ahaca. buranidun ci aljaha amala. yosub baksi i boode emu haha jui banjiha be bi inu donjiha.

薩木薩克的生母厄魯特愛什阿哈察出身於伊犁的準噶爾霍勒博斯（holbos）鄂托克，[48]波羅尼都被清朝解救後就娶其爲妻。回子愛什阿哈察的原夫莫羅米奇特阿訇則爲大小和卓的夙仇阿里和卓、圖爾都和卓父子[49]的屬人，故遭到波羅尼都的屠戮。談及第一個薩木薩克與波羅尼都的關係時，濟爾噶勒的口供與葉格德爾畢比依形成極大反差。後者稱回子愛什阿哈察先委身於波羅尼都，數月後懷孕，濟爾噶勒對此斷然否認——回子愛什阿哈察一開始就被嫁給玉素甫巴什爲妻，只是由於波羅尼都好色，才召她陪侍十餘日。濟爾噶勒還強調，波羅尼都親口否認回子愛什阿哈察之子與他有關，並毫不猶豫地命人直接殺死回

47 巴什之滿文於不同檔案中書寫有異，有：baši、bakši、baksi 等。
48 馮錫時，〈準噶爾各鄂托克、昂吉、集賽牧地考〉，《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 年第 3 期，專號：《衛拉特史論文集》，頁 150。
49 阿里和卓、圖爾都是乾隆皇帝的容妃（野史傳說中的香妃）之父、兄。他們父子與大小和卓有宿仇。

子愛什阿哈察。聯繫相關史實，波羅尼都的四個兒子都在喀什噶爾城破前夕送到中亞，倘若第一個薩木薩克爲大和卓之子，確實沒道理先推托給玉素甫巴什養育，甚至還被父親單獨拋棄在喀什噶爾，波羅尼都的堅定態度無疑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到此爲止，困擾學界的「眞假薩木薩克」事件終於有了初步結論：波羅尼都先後擁有過兩個名字都爲愛什阿哈察的侍妾，母親名字的相同使兒子的身分互相混淆。而在漢文史料中，從未對外提到過有兩個愛什阿哈察的事，導致人們無從分辨消息的情景。例如，在接到舒赫德的奏報後，《平定準噶爾方略》收錄的皇帝上諭內容爲：「舒赫德奏稱，詢問回人台里卜和卓，據稱：波羅泥都有子薩木薩克，係阿里雅斯（伊里亞斯）之妻乳哺。阿里雅斯潛盜波羅泥都屍骸，逃往伊木瑪拉、衮圖斯等處。昨據海明，已查出波羅泥都幼子薩木薩克，今又有同名之人，應行詳察等語。海明前奏波羅泥都逃走時，將伊子交伯什克勒木之密喇卜養育。今據台里卜和卓所稱，則係阿里雅斯並將屍骸盜去。」[50]既不說明海明被欺瞞之經過，亦不揭露薩木薩克的眞實身世，進而造成後人研究的困惑。雖然《方略》的內容大多取材於上諭、奏摺等檔案，但作爲編纂性質的文獻，其本意顯然不在於全面公開朝廷掌握的情報細節，更傾向於紀事及以此宣傳清朝之武功和帝王謀略。可見對於此類問題，滿文檔案在重建史實細節方面的重要性。

（二）清朝的內部困境

至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清朝已基本認定「二子名雖相同，年齡相仿，而隨屍出逃者，似眞布拉呢敦（波羅尼都）之子」。[51]但由於假薩木薩克已被送到北京，並作爲朝廷寬待幼孺的範例而廣泛宣傳，導致清朝陷入極爲被動的境地。更麻煩的是，薩木薩克躲藏的琿都斯、伊穆馬拉等地，位於清朝極爲陌生

50　〔清〕傅恒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12，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戊寅，頁 176-177。

51　〈寄諭參贊大臣舒赫德著留心查訪大和卓木之子薩木薩克〉，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收入《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2，頁 616-617。滿文轉寫爲：“juwe jui udu gebu cilba. se adališacibe. giran be dahame ukakangge. hono buranidun i jingkini jui i gese.”

的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世界。清朝當時對琿都斯的唯一認知，就是在爲索要大小和卓而向素勒坦沙施壓時，對方曾言「琿都斯部落兵來索取二和卓木」。[52]琿都斯在營救大小和卓的同時，清朝大軍已經越過伊西洱庫爾淖爾向巴達克山逼近，卻並未引起前者的絲毫顧慮，這意味著下一階段的工作已非相對單純的內政問題，將取決於清朝能否在西帕米爾高原營造出足夠的政治威勢。

但若只就內政而論，透視「眞假薩木薩克」事件的過程，實能觀察出諸多清朝新疆政策的困境。首先，大和卓在喀什噶爾的影響力並未終結。在識別假薩木薩克身分的過程中，自阿布都喇伊木以下的喀什噶爾諸伯克，無人主動提過兩個愛什阿哈察的事。由此可見，喀什噶爾城原高、中層伯克都在有意無意地隱瞞大和卓子嗣的蹤跡，倘若清朝不追問，他們就不會主動提供更多的消息。大和卓波羅尼都雖然身死，作爲喀什噶爾城政教領袖餘威尚存，以致二十餘年後「喀什噶爾舊隨布拉呢敦回人，皆有想望薩木薩克之意」。[53]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雖然忠於清朝，但他本是拜城人，對大和卓時期的喀城內情不甚了解，所以沒有出現在辨認假薩木薩克的場合，任由阿布都喇伊木等人隱瞞厄魯特愛什阿哈察的存在，推波助瀾地引導海明誤認假薩木薩克。

但這尚皆屬表面問題，「眞假薩木薩克」事件還折射出更深層次的隱憂。回子愛什阿哈察被波羅尼都處死後，假薩木薩克的公開身分一直是「玉素甫巴什之子」。博羅特索丕念及薩木薩克是「大和卓木收娶妻子所生之子」，[54]不惜生命危險將他救到阿爾瓦特莊後，孩子的身分引發了外界的猜測：[55]

> 博羅特索丕臨近居住之尼亞斯索丕……等稱：先前，博羅特索丕帶來此子養育時，因說是玉素甫巴什之子，眾皆不覺。後來，詳察此子舉

52 〈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奏巴達克山歸附並獻霍集占屍骸奏凱旋班師摺〉，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1，頁 402。

53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02，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丙辰，頁 72-73。

54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滿文轉寫爲："amba hojom i bargiyame gaiha hehe de banjiha jui."

55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海明奏聞查獲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69-01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 動姿容，絕非凡人之子。且因此子之母愛什阿哈察又曾在大和卓木跟前數月，眾人皆懷疑談論稱：「想必為大和卓木之子。」此時，博羅特索丕夫妻恐懼，將此子送去愛什阿哈察之妹畢比依愛扎爾處。
>
> bolot sopi hanci šurdeme tehe niyas sopi…sei gisun. neneme bolot sopi ere jui be gajifi ujire fonde. yusub baši i jui sere jakade. geren gemu hercun akū bihe. amala ere jui aššara arbušara banin giru be kimcici. an i niyalmai juse waka bime. ere jui i eniye aiši ahaca geli amba hojom i jakade ududu biya bihe turgunde. geren gemu kenehunjeme urunakū amba hojom i jui seme leoleme gisurecere de. bolot sopi eigen sargan gelefi. ere jui be aiši ahaca i non bibii aijar de benebuhe.

周遭愈演愈烈的傳言使博羅特索丕感到驚懼，唯恐遭到清朝的嚴懲，便將假薩木薩克送到其姨媽家。大約四、五日後，阿爾瓦特莊回子的議論傳到喀什噶爾城回子薩哈特的耳中，薩哈特是被海明的親信兵丁僱傭的回子。由於語言不通以及對綠洲社會的陌生，回疆各城衙門都會僱傭一些本地的回眾充作通事、毛拉（莫洛）和雜役。[56]作爲回子差役的一員，薩哈特將聽到的消息準確無誤地匯報給海明，致使假薩木薩克正式進入清朝喀什噶爾當局的視野。由此可見，假薩木薩克的「出現」最初只是阿爾瓦特莊回子們的即興假想，藉由回民的社會網絡從村莊傳到城鎮。在喀什噶爾城的政治舞臺上，這種假想被數份供詞、證人賦予更多細節，完善爲情節豐富的「現實」，最終被一紙奏摺報告給北京。

「眞假薩木薩克」事件的發展是一個新疆地方社會的謠言被擴大化的過程。其原因並不單單在於葉格德爾畢比依的虛構，以及阿布都喇伊木等伯克的誘導，更在於海明等人對訊息的僵化處理。囿於語言不通，清朝官員獲取新疆資訊的渠道極爲單一，只能通過各城伯克、普通回子的稟報而被動接受，卻無法主動獲取並驗證信息。假薩木薩克的確認過程正是如此。即便後來台里卜和卓從巴達克山帶回眞薩木薩克的消息時，詢問的主導權亦握在額敏和卓手中；

56　馬維漢等著，《西域翻譯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頁 220-225。

至於找到波羅尼都的侍女濟爾嘎勒後，「交付阿奇木伯克公噶岱默特，著從爾家中將濟爾嘎勒帶去，款待飯食，趁機提起詢問此事」。[57]

總體而言，清朝官員搜集、分析和評估資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阿布都喇伊木、額敏和卓、噶岱默特或回子薩哈特這樣的伯克和差役，無法獨立解決問題。直到十九世紀新疆建省以前，情況都沒有根本性的好轉。[58]清朝亦無培養通曉維吾爾語（察合臺語）人才的意願。[59]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葉爾羌辦事大臣復興的一道奏摺曾提到：[60]

>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因吐魯番回子伊布賴瑪兼識滿洲字、回子字，且竟能將回子語直譯為滿洲語，侍郎奇成額等具奏，將伊布賴瑪留於葉爾羌，開設滿學房，伯克、頭人子弟及閑散回子之內，斟酌揀選略有出息之俊才若干教授滿文。
>
> abkai wehiyehe i gūsin jakūci aniya jorgon biyade ashan i amban kicengge se. turfan i hoise iburaima be manju hergen. hoise hergen gemu takambime. hoise gisun be šuwe manjurame hafumbume mutere turgunde. wesimbufi iburaima be yerkiyang de bibufi. manju tacikū boo ilibufi bek data i juse deode. jai sula hoise i dorgi. hūwašara muru bisire giltukan urse be acara be tuwame udu sonjofi manju bithe tacibumbihe.

清朝自始至終都不準備在回疆的駐防官兵中培養維吾爾語人才，而是在當地回眾中培養滿語人才，意味著被動、單向地獲取和驗證資訊的方式已成常態。如

57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舒赫德奏查實薩木薩克是否是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78-001，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滿文轉寫爲：“akim bek gung ni jergi gadaimet de. si jirgal be sini boode gamafi buda ulebu. gisun i ildun de. ere babe jombi fonji seme afabuha.”

58 Ildikó Bellér-Hann, *Community Matters in Xinjiang 1880-1949: Toward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Uyghur* (Leiden: Brill, 2008), p. 126.

59 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299-303。

60 〈葉爾羌辦事大臣復興等奏請每月賞給學習滿語回子五十錢文以示鼓勵摺〉，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九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143，頁 356。

果這套滿一回系統想成功運轉，伯克們的絕對忠誠及高水平的情報能力便是不可缺少的潤滑劑。[61]

但是，額敏和卓或噶岱默特不代表新疆社會的全部，在「眞假薩木薩克」事件的過程中，這一內部困境已在相當程度上阻撓了清朝的行動效率。假設沒有台里卜和卓的情報以及額敏和卓與噶岱默特的協助，清朝將永遠被蒙蔽。在隨後的近百年間，清朝多次與和卓後裔展開較量，而類似阿布都喇伊木的人亦會繼續影響到清朝決策的時效性和準確性。[62]

四、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政治與清代新疆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以波羅尼都三子「將來稍長，安保不別生事端。與其留之，時加防範，不若獻之大皇帝」[63]爲由施壓素勒坦沙；歷經一年多的外交努力，對方終於屈服，向清朝交出波羅尼都的兒子。由此可見，波羅尼都的兒子們雖都身處中亞，清朝倒也未必就鞭長莫及。這就引出最後的問題：同樣是流亡中亞，清朝爲何始終無法拿獲薩木薩克？與三個哥哥相比，薩木薩克的經歷有哪些特殊之處？

在「眞假薩木薩克」事件後，清朝再次收到關於薩木薩克消息的時間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巴達克山遭到愛烏罕大臣沙瓦里汗及琿都斯伯克瑚巴特（Qubad）[64]的圍攻時，爲誘使清朝出兵援助，素勒坦沙奏稱發現薩木薩克「先前居住於愛烏罕，此次隨愛烏罕的軍隊一同前來」。[65]

---

61 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變遷爲中心》，頁 256-258。

62 類似阿布都喇伊木的案例，參見：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pp. 218-220; 李晶，〈試析乾隆朝治理南疆政策得失——以阿其睦、燕起事件爲中心〉，《昆明學院學報》，2014 年第 5 期，頁 45-52。

63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53，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己未，頁 314。

64 瑚巴特的原名爲 Sulṭān Kay Qubād。參考 David Brophy, "High Asia and the High Qing: A Selection of Persian Letters from the Beijing Archives," in Alireza Korangy and Daniel J. Sheffield, eds., *No Tapping Around Philology: A Festschrift for in Honor of Wheeler McIntosh Thackston Jr.'s 70th Birthda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4), pp. 348.

65 〈烏什參贊大臣永貴奏聞處理巴達克山與愛烏罕糾紛情形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83-2277-001，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自西域平定以來，清朝對待中亞事務採取中立原則，避免捲入外藩征伐。因此，乾隆皇帝指示回疆官員，「斷不可插手其互相劫掠之事」，[66]且自信地表示道：「即使薩木薩克來至巴達克山，豈能至喀什噶爾、葉爾羌乎？即使能至，亦無難臨時拏獲。」[67]但這一遊刃有餘的態度很快就發生轉變。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赴京朝覲的噶岱默特歸來時發現：[68]

> 住在愛烏罕所屬瑚巴特地方之波羅尼都子薩木薩克，遣人乞於安集延地方之先前追隨波羅尼都回子莫洛蓋利雅姆，乘便傳話告於現在喀什噶爾回子等，稱我薩木薩克現無資財，甚是貧苦，請資助我稍許物資。莫洛蓋利雅姆所派之人抵達喀什噶爾後，住在此處原追隨波羅尼都之閑散回子伊斯蘭索丕家中。伊斯蘭索丕又派其信賴之回子夏氐克、愛玉默特，去喀什噶爾伯克等及小回子等家中告知。是以，眾人紛紛稍微給予，總計攢湊約千兩銀子，皆交給伊斯蘭索丕。伊斯蘭索丕等用此銀子購買綢緞、茶葉、瓷碗等物後，將兩馱行李及數百兩銀子交給莫洛蓋利雅姆所派之人捎回。
>
> aiugan i harangga hūbat i bade. tehe buranidun i jui samsak niyalma takūrafi anjiyan i bade tehe onggolo buranidun be dahame yabuha hoise mologailiyam de baifi. ildun de ulame kasigar de bisire hoise sede alame. samsak bi te encehen akū umesi yadahūn oho. minde jaka hacin majige aisilarao seme mologailiyam ulame niyalma takūrafi kasigar de isinjifi. daci buranidun be dahame yabuha ubai sula hoise islamsopi i boode teme. islamsopi geli ini akdaha hoise syadik aiyomet be takūrafi kasigar i bek sei boode. geli buyasi hoise sei boode genefi. alame. ede geren teisu teisu majige bufi. uheri minggan yan gese menggun šufafi gemu islamsopi de

66 〈寄諭烏什參贊大臣永貴等著不得插手愛烏罕巴達克山之爭端〉，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收入《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8，頁 658-660。

67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819，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分辛亥，頁 1116。

68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安泰等奏報探獲喀什噶爾回子捐助大和卓之子薩木薩克情形摺〉，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90，頁 335。

buhe. islamsopi se ere menggun i dorgici suje. cai abdaha. yehere moro i jergi jaka udafi mologailiyam takūraha niyalma de juwe aciha jaka. geli udu tanggū yan menggun bufi amasi unggihe.

閑散回子（sula hoise）是指無官、無職、無俸祿的回子，擁有極強的社會動員能力。根據噶岱默特的審訊紀錄，替薩木薩克斂財的使者於五月十一日抵達喀什噶爾，離開時間是二十九日。在短短半個月內，閑散回子伊斯蘭索丕憑藉著人際關係網絡籌集到 1,000 兩白銀，而當時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每年的養廉銀是 800 騰格（一騰格合銀一兩）。[69]這個數目比噶岱默特一年的養廉銀還多，實在令人瞠目結舌，足以證明和卓後裔的潛在社會號召力。此事曝光後，乾隆皇帝再次發起捉拿薩木薩克的行動。由於乾隆四十九年又發生了一次薩木薩克遣人到喀什噶爾斂財的事件，以往學者誤以爲清朝直到那時才意識到薩木薩克的存在和威脅，[70]本文對這一錯誤觀點特加糾正。

乾隆皇帝諭示喀什噶爾、葉爾羌的官員暨噶岱默特、額敏和卓和鄂對等伯克，命其設法誘捕薩木薩克，「薩木薩克居住瑚巴特，雖暫且不能怎樣，但終究係一事，若能將其誘來處置，尚可消除卑賤回子懸望，永息此事」。[71]此外，還暗示素勒坦沙應亡羊補牢，「即此布拉呢敦之子，昔日素勒坦沙如若擒獻，何有今日之事」，[72]要其盡力幫助清朝緝獲薩木薩克。素勒坦沙很快就找到了這樣的機會：[73]

先前琿都斯伯克瑚巴特，與愛烏罕之兵一同攻打巴達克山時，素勒坦沙胞弟特呼巴斯雖被俘至愛烏罕，但接著瑚巴特胞弟策伯拉里亦被素

69 黃志剛主編，《絲綢之路貨幣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頁 375。

70 Kwangmin Kim, *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p. 93; 潘志平，《中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頁 59；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亂研究》，頁 84-86。

71 〈寄諭喀什噶爾辦事都統安泰等著誘拿布拉呢敦之子送京〉，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收入《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8，頁 687-688。

72 〈寄諭葉爾羌辦事大臣旌額理著素勒坦沙再來請兵當嚴辭駁回〉，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收入《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8，頁 689-690。

73 〈署喀什噶爾辦事大臣秦璜派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往巴達克山探聽薩木薩克信息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84-2359-014，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勒坦沙擄去。瑚巴特還派人將情願在愛烏罕之特呼巴斯取出給還。換取伊弟策伯拉里時，素勒坦沙駁回，稱若想要策伯拉里，就將薩木薩克及吾弟特呼巴斯一併帶來後，才會給還策伯拉里。言罷，撤退。薩木薩克聽聞此消息後，攜其屬人將近百名，遷向彼琿都斯之伊穆馬村居住。

onggolo hundus[74] i bek hūbat. aiugan i coohai sasa badakšan be baime afandure de. sultanša i deo terebas be udu aiugan de oljilame gamabuha bicibe. sirame hūbat i deo seper ali be inu sultanša de tabcilabuha. hūbat hono niyalma be takūrafi cihangga aiugan de bisire terebas be gaime tucibufi amasi bufi. ini deo seper ali be hūlašame gaire de. sultanša i gisun. aika seper ali be gaici. samsak. jai mini deo terebas be suwaliyame gajiha manggi. teni seper ali be bumbi seme gisurefi bederebuhe. samsak ere mejige be donjifi. ini fejergi tanggū isirei niyalma be gaifi. hūndus i cargi imam sere gebungge gašan de gurinefi tehe.

這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二月噶岱默特派間諜到巴達克山時探得的情報。素勒坦沙與沙瓦里汗、瑚巴特的聯軍作戰時，俘虜了瑚巴特的弟弟，趁著兩方互換俘虜的機會索要薩木薩克。由此可見，素勒坦沙執行了乾隆皇帝的旨意，想盡辦法抓捕薩木薩克。在瑚巴特答覆前，薩木薩克急忙帶領屬下逃回琿都斯。

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由素勒坦沙移交給清朝的薩木薩克的侍從厄魯特人努爾默特（nurmet）又提供了新消息：[75]

素勒坦沙將霍集占兄弟抓獲當夜，薩木薩克之乳公里亞斯將薩木薩克帶走，逃去名為伊穆馬處之米薩喇布伯克跟前。在彼處居住兩年後，愛烏罕伯克艾哈邁德沙派人將薩木薩克喚走，在古爾地方過冬。次年春，抵達艾哈邁德沙居住之喀布爾地方。愛烏罕伯克艾哈邁德沙出征

74 琿都斯之滿文於不同檔案中書寫有異，有：gūndus、hūndus、gundus、hundus 等。

75 〈大學士傅恒等奏自葉爾羌解京厄魯特等供出薩木薩克情形片〉，《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84-2369-011，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十一日。

溫都斯坦地方時，將薩木薩克帶走。一年後，回到喀布爾居住，因未曾學習，遂告於艾哈邁德沙後，遷徙到拜喇哈處。依附尼旺、哈濟比二人居住三載後，愛烏罕之人在拜喇哈地方放縱劫掠，將薩木薩克一併帶走，交付給琿都斯伯克瑚巴特安置。現在琿都斯錫特拉克地方居住。

sultanša. hojijan i ahūn deo be jafaha dobori. samsak i huhun i ama liyat samsak be gaifi imam sere ba i misarab bek i jakade ukame genehe. tubade juwe aniya tehe. amala aiuhan i bek aihamatša i baci niyalma takūrafi samsak be hūlame gamafi. gori bade tuweri hetumbuhe. jai aniya niyengniyeri aihamatša i tehe kabul i bade isinaha. aiuhan i bek aihamatša undustan i bade coohalame genere de. samsak be gaifi gamaha. emu aniya yabufi amasi kabul de jihe. teme tacihakū ofi. aihamatša de alafi bailaha i bade gurifi. niwang. hajibi juwe niyalma de nikeme ilan aniya tehe. amala aiuhan i niyalma bailaha i bade tabcin sindame yabure de samsak be suwaliyame gamafi. hūndus i bek hūbat de afabufi tebuhe. ne hūndus siterak i bade teheb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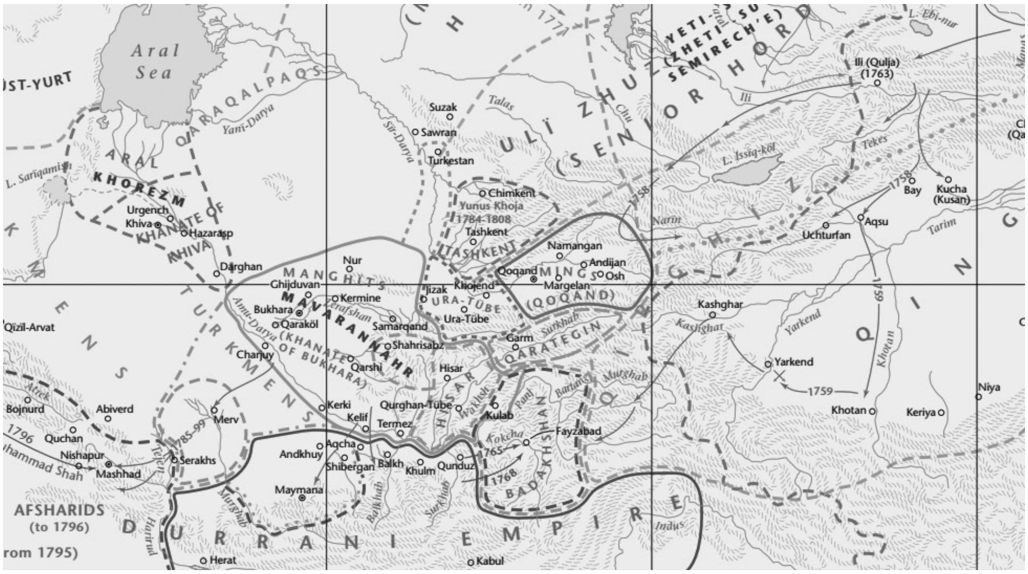
愛烏罕（aiuhan）是清朝對阿富汗的稱呼，古爾（gor）、喀布爾（kabul）分別是阿富汗的省分、首都，溫都斯坦（undustan）指印度北部，[76]而琿都斯（hūndus）即位於阿富汗東北地區的昆都士。1759 年，薩木薩克一行人先來到伊穆馬（imam），即此前台里卜和卓所言的伊穆馬拉（imamla）。[77]1761 年底，艾哈邁德沙找到薩木薩克後，先將他接到古爾，再於 1762 年搬到喀布爾。同年，艾哈邁德沙在第六次進攻印度、鎮壓旁遮普的錫克人時，亦將薩木薩克帶在身邊。1763 年回到喀布爾後，薩木薩克獲准遷徙到拜喇哈城。1766

[76]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pp. 87-93.

[77] 伊穆馬拉很可能是位於阿富汗東北部的 Imām Sāhib，也被稱為 Hazrat Imām，距離琿都斯大約有 60 公里。

年，艾哈邁德沙又把薩木薩克交托給昆都士的瑚巴特安置。由此可見，薩木薩克的早年經歷與中亞帕米爾高原以西的政治局勢和政治人物牽連極深。

圖 1　十八世紀後期的中亞政治地圖



資料來源：Yuri Bregel, "Map No.30: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Bukhara, Khorezm, Qoqand, the Qazaqs, and the Junghars," in *An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sia* (Leiden-Boston: Brill, 2003), p. 61.
說明：圖上繪有喀什噶爾（Kashghar）、巴達克山（Badakhshan）、昆都士（Qunduz）、杜蘭尼王朝（Durrani Empire）及其首都喀布爾（Kabul）等與本文有關的地名標識。

清朝當初向素勒坦沙索要大小和卓時，後者唯恐因順從清朝的要求而招致中亞仇國的報復，遂以「我等信奉經典，向無自縛回人轉送他處之例」[78]爲由婉拒。不過，清朝橫掃天山南北的強勢給當時的中亞世界帶來極大的震撼，[79]迫使素勒坦沙甘冒違反伊斯蘭教義的風險順從清朝。在處置波羅尼都兒子的問

[78] 〈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奏巴達克山歸附並獻霍集占屍骸奏凱旋班師摺〉，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1，頁 402。

[79] Chokan Valikhanov, "Alty-shahr: Historical Review," in Capt. Valikhanof and M. Veniukof, eds.,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z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Daria*, trans. John and Robert Michell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65), p. 188.

題上，素勒坦沙亦表現出同樣的掙扎心態。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台里卜和卓便有報告：[80]

> 素勒坦沙的下屬伯克等稟報稱：「二和卓木皆已被我等所殺，存留伊子何用？不如亦殺之。」素勒坦沙稱：「因二和卓木皆被我所殺，今我已得一惡名。此三子皆孩童也，想來能成什麼事？暫且留下，再慢慢處置。」
>
> sultanša i fejergi bek sei sultanša de alaha gisun. juwe hojom be muse gemu wahabi. ini juse be kemuni werifi ainambi. inu wara de isirakū seme alaha manggi. sultanša i gisun. juwe hojom be bi gemu waha turgunde. te bi emu ehe gebu gaihabi. ere ilan gemu teniken juse. gūnici ai baita mutebure. taka werifi elheken i icihiyaki seme gisurehe.

素勒坦沙深知，如果將波羅尼都的兒子處死或交與清朝，自己因擒殺大小和卓而在中亞伊斯蘭世界招致的惡名會進一步擴大，但這種畏懼情緒並未阻止他在幾年後按照清朝的要求，將薩木薩克的三個哥哥交給清朝。據此猜測，薩木薩克的乳父伊里亞斯或許擁有敏銳的政治嗅覺，他在大小和卓死亡的當夜就意識到：倘若繼續留在巴達克山，薩木薩克早晚要被巴達克山獻給清朝，便帶著薩木薩克連夜逃到艾哈邁德沙的勢力範圍內。[81]

艾哈邁德沙是杜蘭尼王朝的開創者，統治期間以文治武功而聞名。他曾是波斯阿爾夫沙王朝國王納迪爾沙（Nader Shah）的親信，1747 年納迪爾沙去世後，其軍中的阿富汗人於坎大哈（Kandahar）擁護艾哈邁德沙稱王，自此開始

80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舒赫德奏請派人到巴達克山設法帶回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79-1876-018，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81　伊里亞斯的原名是 Abū al-Ḥāshim。根據乾隆二十八年素勒坦沙寫給葉爾羌辦事大臣新柱的波斯文信件，在接觸艾哈邁德沙前，伊里亞斯先帶著薩木薩克逃到了同大小和卓交好的「蘇萊曼汗」（Sulaymān Khān）處。「蘇萊曼汗」或即「伊穆馬處之米薩喇布伯克」。參考 David Brophy, "High Asia and the High Qing: A Selection of Persian Letters from the Beijing Archives," in *No Tapping Around Philology: A Festschrift for in Honor of Wheeler McIntosh Thackston Jr.'s 70th Birthday,* p. 339.

了統一阿富汗及領土擴張的戰爭。[82]自 1751 年以来，艾哈邁德沙的勢力就延伸到帕米爾高原西南地區，在巴爾赫、巴達克山和興都庫什山以北等地都擁有強大的影響力。[83]大小和卓被素勒坦沙擒獻時，他們的屬人便曾向艾哈邁德沙求援，艾哈邁德沙先遣使前往巴達克山表示欲追究問罪，素勒坦沙感到懼怕，遂將清朝賞賜的二盞燈及華麗絲織品轉獻給艾哈邁德沙，並解釋其乃不得已而爲之；艾哈邁德沙不費兵卒便使素勒坦沙區服。[84]因此，杜蘭尼王朝是當時除清朝外唯一能直接威懾巴達克山的政權。

幼年的薩木薩克受到了艾哈邁德沙的周密保護。無論是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城、戰火紛飛的溫都斯坦，還是昆都士，都將清朝阻隔在外，以至在乾隆三十三年薩木薩克主動現身以前，清朝探聽不到任何有關他的消息。這是由於在十八世紀中後期，清朝對中亞政治的影響極限只到哈薩克、浩罕和巴達克山等地，[85]對遙遠的阿富汗望塵莫及。況且乾隆皇帝君臣深知艾哈邁德沙的實力不可小覷，遂對「愛烏罕愛哈默特沙所有之地」發生的任何事務，素來持「不必辦理」之意見，避免與其發生衝突。[86]艾哈邁德沙保護和卓後裔的原因在於需要藉由宗教鞏固其在帕米爾西南地區的征服成果，亦即將自身的軍事行動合法化。[87]在中亞，宗教影響力最大者莫過於蘇菲派的納克什班迪耶教團，以馬哈圖姆．阿雜木（Makhdūm-i A‘ẓam）爲始祖的「喀什噶爾和卓家族」[88]更

82 Chahryar Adle, Irfan Habib, and Karl M. Baipakov, ed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V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UNESCO, 2003), pp. 285-290.

83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pp. 80-83.

84 李晶，〈乾隆年間清朝與阿富汗關係新探〉，《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頁 122。

85 Takahiro Onuma,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entral Asian Neighbors," *Saksaha: A Journal of Manchu Studies*, Vol. 12 (2014), pp. 33-48; 賈建飛，〈清朝對中亞諸部的政策探析——以 1759-1864 年爲中心〉，《社會科學輯刊》，2007 年第 1 期，頁 153-159。

86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pp. 86-87. 愛哈默特沙即艾哈邁德沙。

87 Jos J. L. Gommans, *The Rise of the Indo-Afghan Empire: C. 1710-1780* (Leiden: E. J. Brill, 1995), pp. 61-66.

88 十六世紀初，納克什班迪耶的第五代領袖瑪哈圖木．阿雜木的子孫來到喀什噶爾，成爲當地最強大的宗教勢力，史稱「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參考：David Brophy, "Confusing Black and White: Naqshbandi Sufi Affilia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to Qing Rule in the Tarim Basin, " *Late Imperial*

是其中翹楚，他們在浩罕、巴達克山、昆都士和巴爾赫等地都廣受尊敬。大小和卓及薩木薩克都出自這個家族。當清朝的勢力抵達帕米爾高原時，艾哈邁德沙便決定利用中亞各政權對清朝的疑懼心理，打著維護和卓後裔的名義，樹立起自己作為中亞伊斯蘭世界的領袖和保護者的形象。[89]

自 1766 年起，薩木薩克的保護者從艾哈邁德沙變為昆都士的瑚巴特，這仍與中亞政局有關。艾哈邁德沙與瑚巴特之間雖存在名義上的隸屬關係，在清朝檔案中能看到「愛烏罕所屬瑚巴特」（aiugan i harangga hūbat）的字樣；但這種統治只是名義上的，昆都士的真正統治者是瑚巴特。[90]作為巴達克山的近鄰，昆都士與巴達克山的爭鬥由來日久，在大小和卓被素勒坦沙囚禁期間，「渾都斯（昆都士）領兵五千，不念素爾坦沙係派哈巴爾（paihabar）後嗣，全行搶擄，勒取兩和卓木」。[91]1768 年，艾哈邁德沙便利用瑚巴特與素勒坦沙的仇恨，派屬下沙瓦里汗率兵與昆都士組建聯軍，發起新一輪對巴達克山的征伐，而昆都士開出的交換價碼可能就是薩木薩克。因此，薩木薩克在交換戰俘期間毫不猶豫逃回昆都士。他深知昆都士才是安全區域，巴達克山處於清朝的勢力範圍以內，實屬險境之地。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清朝通過瓦罕伯克提供的消息，得知素勒坦沙被瑚巴特擊敗俘虜後，關押在昆都士的監獄。[92]三十六年（1771）五月，素勒坦沙的兒子邁瑪特沙（maimatša）向葉爾羌辦事大臣期成額通報了素勒坦沙的最終命

China, 39:1 (June 2018), pp. 29-65; Joseph F. Fletcher, “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in B. F. Manz, ed.,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pp. 4-7; 劉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頁 105-110。

89 李晶，〈乾隆年間清朝與阿富汗關係新探〉，《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頁 125。

90 R. D. McChesney, *Waqf in Central Asia: Four Hundred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a Muslim Shrine, 1480-1889*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27-229.

91 〈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奏巴達克山歸附並獻霍集占屍骸奏凱旋班師摺〉，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41，頁 397。

92 〈葉爾羌辦事大臣期成額等奏報瓦罕伯克遣使告知巴達克山與愛烏罕交戰情形摺（附呈文箚付 3 件）〉，乾隆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95，頁 325。滿文轉寫為：“sultanša ini cooha be suwaliyame gemu hūbat de jafabuha. ne sultanša……be ciralame tuwakiyafi.”

運，「瑚巴特這般惡行，皆爲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事。所以將吾父擒獲後，交予薩木薩克處決」，[93]薩木薩克依靠瑚巴特報了當年素勒坦沙的殺父之仇。

此外，薩木薩克與瑚巴特之間還有極其親密的私人關係，薩木薩克是瑚巴特的女婿：[94]

琿都斯的瑚巴特將其女嫁與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為妻後，愛烏罕的特穆爾沙派其屬下首領名為米圖瓦里罕之人，於去年七月在琿都斯地方同瑚巴特交戰三月。瑚巴特因不敵退回，對其婿薩木薩克言道：「爾乃吾婿。吾予爾兵三千，若能驅退特穆爾沙之米圖瓦里罕之師，吾取爾父喀什噶爾之故土後，欲給予你。」薩木薩克聽從其語，於去年十一月，率瑚巴特所屬兵三千，與米圖瓦里罕交戰。薩木薩克之三千兵潰敗時，薩木薩克僅將其親信厄魯特、回子總共六百人帶走抵禦，卻不能退回，遭到敵人米圖瓦里罕兵的阻擊時，薩木薩克右肩被鳥槍擊中後被擒。

hundus i hūwat ini sargan jui be buranidun i jui samsak de sargan obume buhe. amala aiugan i temurša i baci. ini fejergi dalaha mituwaligan sere gebungge niyalma be tucibufi. duleke aniya nadan biyade. hundus i bade hūwat i baru ilan biya afaha. hūwat dain bederebume muterakū turgunde. hūwat ini hojihon samsak de. si mini hojihon. bi sinde ilan minggan cooha bufi. temurša i mituwaligan i dain be bederebume muteci. bi sini amai kašigar i nukte be gaifi sinde buki seme gisurehede. samsak ini gisun be alime gaifi. duleke aniya omšon biyade. hūwat i ilan minggan cooha be gaifi. mituwaligan i baru afarade samsak i ilan minggan cooha gidabufi.

93 〈葉爾羌辦事大臣期成額等奏巴達克山內訌買瑪特沙等請求出兵保護摺（附箚付呈文奏書 8 件）〉，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100，頁 78。滿文轉寫爲：“hūbat uttu ehe yabuhangge. gemu buranidun i jui samsak i jalin. tuttu mini ama be jafafi samsak de afabufi waha.”

94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福森布等奏向阿奇木伯克噶岱莫特打探大和卓木波羅泥都兒子消息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86-2578-041，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 amasi burulaha. samsak damu ini hanci bisire ūlet. hoise uheri ninggun tanggū niyalma be gaifi. sujame eljeme burulahakū. ishunde bakcilahai mituwaligan i cooha samsak be kame afarade. samsak i ici ergi meiren miyoocan de goifi jafabuha.

在這層翁婿關係的庇護下，薩木薩克的安全穩如磐石，清朝的誘捕策略自然毫無成效。但是，薩木薩克和瑚巴特的關係也使他捲入瑚巴特與艾哈邁德沙之子帖木兒沙（即特穆爾沙）的爭鬥中。1772 年艾哈邁德沙的去世給杜蘭尼王朝帶來內亂，各方勢力都在挑戰帖木兒沙的繼承權。[95]在艾哈邁德沙死後不久，瑚巴特就與帖木兒沙展開激烈戰鬥。[96]瑚巴特爲誘使女婿薩木薩克跟他一起推翻帖木兒沙，許諾自己未來若攻取「爾父喀什噶爾之故土」後，必贈予薩木薩克。這番話透露出瑚巴特當初要求轉移薩木薩克的動機，顯然將其視作挾以自重的籌碼，希望通過女婿的身分來實現自己對喀什噶爾的野心。

得到岳父的許諾後，薩木薩克欣然率軍出戰，卻以失敗告終。不僅薩木薩克淪爲阿富汗的俘虜，同時瑚巴特也遭到來自昆都士內部的挑戰，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敗落。[97]不過，帖木兒沙沒有爲難薩木薩克，很快就釋放了他；但薩木薩身邊原有的 600 名厄魯特、回子親兵，幾乎全被帖木兒沙收爲己有，只剩下十幾個人供其使喚。自此開始，薩木薩克失去了阿富汗的庇護和援助。乾隆四十年（1775）八月，葉爾羌辦事大臣瑪興阿接到情報：[98]

95 Chahryar Adle, Irfan Habib, and Karl M. Baipakov, ed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V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pp. 290-292.

96 R. D. McChesney, *Waqf in Central Asia: Four Hundred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a Muslim Shrine, 1480-1889*, p. 228.

97 關於瑚巴特被推翻的過程，參考 David Brophy, "High Asia and the High Qing: A Selection of Persian Letters from the Beijing Archives," in *No Tapping Around Philology: A Festschrift for in Honor of Wheeler McIntosh Thackston Jr.'s 70th Birthday*, p. 349.

98 〈葉爾羌辦事大臣瑪興阿等奏報巴達克山內戰即將爆發及大和卓之子薩木薩克近況〉，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125，頁 385。

> 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現身在琿都斯所屬名為伊穆馬村。伊跟前，唯有阿卜都爾曼等將及二十人隨侍，其餘人皆被愛烏罕之特穆爾沙取走。現衣食皆由琿都斯伯克胡達尼扎爾供給。
>
> buranidun i jui samsak ne hūdus i harangga imam sere gašan debi. ini jakade. damu abdurman i jergi orin hamišara niyalma dahalambi. funcehe urse aiugan i temurša gemu gaifi gamaha. te eture jeterengge gemu hūdus i bek hūdanidzar ci bahabumbi.

胡達尼扎爾（Khuda Nazar）是在阿富汗的支持下推翻瑚巴特而上位的昆都士新任統治者。[99]他會對瑚巴特的女婿持何種態度，想來毋庸贅言。儘管薩木薩克身爲和卓後裔，一旦被認爲失去利用價値，就立刻門庭冷落。果不其然，胡達尼扎爾沒過幾年就切斷了對薩木薩克的供給，導致他陷入極其清苦的境地。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清朝官員聽說薩木薩克離開了自己長期生活的伊穆馬村，淪爲四處雲遊乞討的「海連達爾」（hailiyandar）。[100]四十九年二月，遊蕩至「布哈爾之附近撒馬爾罕」（bugar i hanci semergan）[101]的薩木薩克無法忍受貧苦的生活，派人送信到喀什噶爾，第二次請求當地回子們給他提供財物上的幫助。此事發生後，乾隆皇帝再次注意到薩木薩克與喀什噶爾回子勾結的情況，清朝的安全開始遭到成年的和卓後裔的挑戰。

五、結　語

十九世紀初，薩木薩克的後代多次聯手浩罕衝擊新疆的邊境。這一歷史結果，導致清朝和中亞關係史研究多以浩罕汗國作爲重點。但眞實的歷史要較之

---

99 R. D. McChesney, *Waqf in Central Asia: Four Hundred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a Muslim Shrine, 1480-1889*, p. 229.

100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瑪興阿等奏報探獲布拉尼敦之子薩木薩克行蹤摺〉，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收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141，頁 302-304。海連達爾也作海蘭達爾，乃波斯文 Qalandar 的音譯，這是對蘇菲派苦修者的稱謂。

101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保成奏報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派人送來文書並請內遷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編號 03-0190-2999-025，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九日。

更爲複雜。本文對薩木薩克從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巴達克山、阿富汗和昆都士地區向布哈拉、費爾干納盆地遷徙的過程構建，正是對這種複雜性的呈現。

與傳統對清代封貢關係的「虛幻性」想像不同，[102]乾隆皇帝積極地利用清朝和巴達克山的關係，以保障邊疆的安全和穩定。[103]無論是引渡薩木薩克的三個兄長，還是在同阿富汗、昆都士聯軍交換戰俘時趁機索要薩木薩克，素勒坦沙最終都執行了乾隆皇帝的旨意，無愧於清朝在帕米爾高原以西地區藩籬的身分。倘若薩木薩克藏於巴達克山，抑或庇護薩木薩克的中亞國家、部族弱於巴達克山，薩木薩克的問題也許早就解決了。

然而，清朝與巴達克山的關係不足以將薩木薩克拿獲歸案，這是由於薩木薩克受到的保護遠超清朝政治的極限。以阿富汗爲例，儘管清朝的官方文獻稱「愛烏罕」爲外藩，但乾隆皇帝君臣從未眞正將其視作藩屬，而杜蘭尼王朝亦未將清朝當作天朝上國，這在乾隆二十八年艾哈邁德沙的使者拒絕對乾隆皇帝叩首所引發的「禮儀之爭」中得到充分體現。[104]因此，清朝及巴達克山不能冒著觸怒強鄰的風險，深入到自身勢力未及的地方強行擄走薩木薩克，只能等待像交換俘虜這樣的時機才能行動。不過，薩木薩克固然憑藉「奇貨可居」的身分及中亞的政治博奕而平安成長，反過來亦因過度參與中亞的政治事務而自食苦果，淪爲以乞討爲生的「海連達爾」，這種命運對人生的捉弄著實令人感嘆。

乾隆四十九年起，薩木薩克對清朝的挑戰公開化。但有趣的是，薩木薩克本人自始至終都未對新疆的安全造成多少實質性的傷害，反而是清朝內部的一系列問題才帶來動蕩不安。例如，第二次薩木薩克寄信斂財案發生後，先是由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鄂斯璊告發布魯特奇卜察克部的散秩大臣阿其睦家族私通薩木薩克，後者又反過來串聯其他回城伯克向參贊大臣綽克托攻訐前者才是

102 莊國土，〈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爲例〉，《南洋問題研究》，2005 年第 3 期，頁 153-159。

103 陳尚勝，〈論清朝前期封貢體系的基本特徵〉，《中國傳統對外關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160-174。

104 李晶，〈乾隆年間清朝與阿富汗關係新探〉，《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頁 123-124。

通賊之人。隨著紛紜複雜的訊息接踵而至，回疆和北京官方均焦頭爛額，無從及時分辨孰是孰非，只能通過猜測、推理的低效方式處理問題。[105]

在二十多年前的「眞假薩木薩克」事件中，阿布都喇伊木隱瞞厄魯特愛什阿哈察身分時所暴露出的內部困境仍然存在，並與新的外部困境（崛起的浩罕）共同成爲和卓後裔捲土重來的推動因素。

---

105 李皛，〈試析乾隆朝治理南疆政策得失——以阿其睦、燕起事件爲中心〉，《昆明學院學報》，2014 年第 5 期，頁 48。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清〕和寧纂，《回疆通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清〕傅恒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53，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清〕劉統勛、傅恒等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00，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社，2011。

二、專著

王力，《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佐口透著，凌頌純譯，《18-19 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馬維漢等著，《西域翻譯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

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變遷爲中心》，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

黃志剛主編，《絲綢之路貨幣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劉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亂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潘志平，《中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潘志平，《浩罕國與西域政治》，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Adle, Chahryar, Irfan Habib, and Karl M. Baipakov, ed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V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UNESCO, 2003.

Bellér-Hann, Ildikó. *Community Matters in Xinjiang 1880-1949: Toward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Uyghur*. Leiden: Brill, 2008.

Bregel, Yuri. *An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sia*. Leiden-Boston: Brill, 2003.

Forsyth, T. D.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Under Command of Sir T. D. Forsyth.* Calcutta: Printed at the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1875.

Gommans, Jos J. L. *The Rise of the Indo-Afghan Empire: C. 1710-1780.* Leiden: E. J. Brill, 1995.

Kim, Hodong.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Kim, Kwangmin. *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Levi, Scott C. *The Rise and Fall of Khoqand, 1709-1876: Central Asia in the Global Ag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7.

McChesney, R. D. *Waqf in Central Asia: Four Hundred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a Muslim Shrine, 1480-1889.*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llward, James A.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Mosca, Matthew W.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Newby, L. J.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1760-186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

四、論文及專文

王希隆，〈乾隆、嘉慶兩朝對白山派和卓後裔招撫政策得失述評〉，《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2 期，頁 36-48。

李皛，〈乾隆年間清朝與阿富汗關係新探〉，《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頁 121-130。

李皛，〈試析乾隆朝治理南疆政策得失——以阿其睦、燕起事件爲中心〉，《昆明學院學報》，2014 年第 5 期，頁 45-52。

眞田安，〈乾隆 25 年カシュガル反乱：中央アジア・オアシス社会の権力構造の究明にむけて〉，《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號 38，2014 年 3 月，頁 112-148。

馬子木，〈乾隆朝初通巴達克山考——兼論準噶爾遺產與清朝中亞外交之初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2 分，2017 年 6 月，頁 347-396。

莊國土，〈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爲例〉，《南洋問題研究》，2005 年第 3 期，頁 153-159。

陳尙勝，〈論清朝前期封貢體系的基本特徵〉，《中國傳統對外關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160-174。

馮錫時，〈準噶爾各鄂托克、昂吉、集賽牧地考〉，《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 年第 3 期，專號：《衛拉特史論文集》，頁 147-158。

賈建飛，〈清朝對中亞諸部的政策探析——以 1759-1864 年爲中心〉，《社會科學輯刊》，2007 年第 1 期，頁 153-159。

潘志平，〈1759 年－1911 年新疆的變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42-55。

Brophy, David. "Confusing Black and White: Naqshbandi Sufi Affilia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to Qing Rule in the Tarim Basin." *Late Imperial China,* 39:1 (June 2018), pp. 29-65.

Brophy, David. "High Asia and the High Qing: A Selection of Persian Letters from the Beijing Archives." In Alireza Korangy and Daniel J. Sheffield, eds., *No Tapping Around Philology: A Festschrift for in Honor of Wheeler McIntosh Thackston Jr.'s 70th Birthda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4, pp. 325-367.

Fletcher, Joseph F. "Ch'ing Inner Asia c.18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5-106.

Fletcher, Joseph F. "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In B. F. Manz, ed.,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pp. 1-46.

Kashgari, Muhammad S. "The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 Turkistan." Translated by Robert B. Shaw,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Bengal,* Vol. LXVI, Part I, 1897, supplement, pp. 1-67.

Kim, Kwangmin. "Profit and Protection: Emin Khwaja and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1759-177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 3 (August 2012), pp. 603-626.

Onuma, Takahiro, Kawahara Yayoi, and Shioya Akifumi. "An Encounter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Khoqand in 1759-1760: Central Asia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9:3 (2014), pp. 384-408.

Onuma, Takahiro. "The 1795 Khoqand Mission and Its Negotiations with the Qing: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Space of Qing Kashgaria." In Ildikó Bellér-Hann, Birgit N. Schlyter, and Jun Sugawara, eds., *Kashgar Revisited: Uyghur Studies in Memory of Ambassador Gunnar Jarring.* Leiden: Brill, 2016, pp. 91-115.

Onuma, Takahiro.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entral Asian Neighbors." *Saksaha: A Journal of Manchu Studies,* Vol. 12 (2014), pp. 33-48.

Valikhanov, Chokan. "Alty-shahr: Historical Review." In Capt. Valikhanof and M. Veniukof, eds.,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z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Daria.* Translated by John and Robert Michell.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65, p. 188.

The Early Life of Sarimsaq Khwaja: The Polit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Kashgar and Territories West of Pamir, 1759-1784

Hui Na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Qing conquest in 1759, the young Sarimsaq Khwaja, brought by his father Burhan al-Din, escaped to Central Asia. Sarimsaq Khwaja and his descendants thenceforth prepared for the Khwaja family's comeback in southern Xinjiang for many years. However, two key questions about Sarimsaq Khwaja are still unresolved. First, the Qing's officials in Kashgar were informed that there were two Sarimsaq Khwajas when they were searching for him, so the truth of Sarimsaq Khwaja's birth remains a mystery. Second, it is a well-known fact that the elder Sarimsaq Khwaja used to live in the Khoqand Khanate, while his early life is little known. This article solves these two questions of Sarimsaq Khwaja's life by using a series of Manchu archives, showing the intern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Qing dynasty's rule in Kashgar. In addition, it also reveals Sarimsaq Khwaja's intercourse with Badakshan's ruler Sultan Shah, Ahmed Shah and Timur Shah of the Afghan Durrani, and Qubad, the former governor of Kunduz, all of whom were political figures in Central Asian territories west of Pamir. This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Keywords: Khwaja brothers, Sarimsaq Khwaja, Badakshan, Afghan Durrani, Kunduz

*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